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

《 成果要报 》

2016年第48期

(总第66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 编

2016年12月14日

我国应该加强 西方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

贾根良

【内容简介】战后以来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经济理论内部，非马克思主义的非正统经济学不仅发生了与西方正统经济学之间的尖锐对立，而且也出现了与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融合”发展的局面，“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已不能反映和容纳这种巨大变化的新情况。由于我国大学中讲授的“西方经济学”是清一色的西方正统经济学，因此，笔者将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非正统经济学命名为“西方政治经济学”。由于“西方政治经济学”对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和规律的研究比“西方经济学”提供了更现实和更深刻的描述和分析，其理论研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也具有直接的和重要的借鉴价值，因此，我国经济理论界应该大力加强对“西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并对高等学校财经类专业西方经济理论的本科课程设置进行改革：在本科教学课程时数已经无法增加的情况下，压缩“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将“西方政治经济学”增列为与之具有同等地位的核心课程。

长期以来，在我国经济理论界，“西方经济学”专指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相对立的西方国家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特别是西方国家现代主流派的理论经济学。但自战后以来，在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经济理论内部，非主流经济学不仅成为了一种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相对立的经济理论体系，而且，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也形成了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融合”发展的局面，“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已不能反映和容纳这种巨大的变化。由于在我国大学中讲授的“西方经济学”是清一色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因此，按照经济思想史中经济学研究传统的区分，以及在我国学术话语体系中“西方”作为政治性概念的约定俗成，笔者将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非正统经济学简洁地命名为“西方政治经济学”。

西方政治经济学包括老制度主义经济学、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熊彼特经济学、女性主义经济学、社会政治经济学和替代性教规经济学等诸多流派，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名噪一时的海曼·明斯基就属于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承担着为资本主义经济现状进行辩护的意识形态功能不同，“西方政治经济学”之所以不能成为西方国家的主流经济学，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一直坚持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缺陷进行批判性研究，虽然他们是出于改良和完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目的。同时，由于继承了源远流长的政治经济学传统，“西方政治经济学”一直在对“西方经济学”的哲学基础、“自闭症”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其有关市场经济的非现实的和歪曲的描述进行批判。因此，西方国家的主流经济学派动用国家力量和清除异己的大学科研绩效评估制度（类似于我国高等学校的学科评估）打击和排挤这种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政治经济学”，使之在西方国家遭受着与马克思主义—激进主义经济学同样的命运。

与此同时，由于“西方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

建立在实在论的哲学基础之上（20世纪90年代，“西方政治经济学”宣称“批判实在论”是其统一的哲学基础，而马克思则是后者首屈一指的前驱），都使用社会—历史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在其理论体系中，历史、制度和社会阶级的互动被赋予了中心地位，因此，在20世纪上半叶，“西方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开始了相互借鉴的活动，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它们之间的这种多元化理论接触开始成为一种普遍性的趋势，以至于弗雷德里克·李在《非正统经济学史》中指出，到了1990年，包括马克思主义-激进主义经济学在内的很多非主流经济学家在各种方法之间已经看不到明显的理论界线，这一结果反映了理论上的整合已经发生。在这种情况下，“西方政治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再是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相对立的经济理论体系。因此，虽然“西方经济学”这个概念准确地反映了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经济理论的本质，但它是在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经济理论内部没有发生严重对立的情况下使用的术语，已不能反映和容纳“西方政治经济学”与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融合”发展的巨大变化。

但是，在我国经济学界，目前只有极少数的学者关注“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大学中讲授的“西方经济学”是清一色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虽然有些经济学院开设有“现代西方经济学流派”，但在还没有讲授到“西方政治经济学”流派的时候，课时就不够了。因此，我们可以说，“西方政治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研究的一种重要传统在我国大学本科教学中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状况呢？一方面，当“西方经济学”通过打压和排挤将“西方政治经济学”从西方国家的名牌大学中清除掉之后，除了极少数学者外，我国在大规模引进西方经济理论时，人们注意到的就只能“西方经济学”了；另一方面，福山式的“历史终结论”对我国引进西方经济理论的支配性影响：在冷战

时期，由于东西方对抗，苏式政治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都走向了极端和教条，冷战的结束导致了前者的终结，但这不仅没有导致后者的终结，反而使之成为了“伦敦城唯一的游戏”。在这种情况下，缺乏多元主义的科学精神就必然成为了我国在引进西方经济理论上的重大缺陷。

实际上，柏林墙的倒塌并不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胜利，而是其统治地位终结的开端。2000年，法国学生发起了颠覆西方主流经济学统治地位的“经济学改革运动”，学生们使用精神病学的一个术语痛斥西方正统经济学的“自闭症”，指责其已经没有能力解决真实世界的许多重要经济问题，呼吁经济学发展的多元化、批判性思考和对真实世界的研究，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新一轮“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再次兴起，在三十多个国家涌现出了众多的“后危机经济学社团”、“重新思考经济学联盟”等组织。2014年5月5日，来自19个国家的42个学生团体发起成立了“国际学生经济学多元化倡议行动”；一年之后，这一组织就已发展到了31个国家的82个学生社团。学生们呼吁在西方国家的大学中开设“西方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同的校园，同一的心愿，我们期盼，经济学课程能有所改变”。笔者认为，我国高等学校的西方经济理论教学也应该多元化，这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我国经济科学的繁荣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西方政治经济学”对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和规律的研究比“西方经济学”提供了更真实和更深刻的描述和分析，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比“西方经济学”提供了更实际和更有用的借鉴价值。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经济学界一直流行着这样一种看法：“西方经济学”是对现代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系统反映和描述，它建立了市场经济中经济规律的理论，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我国来说，需要认真学习、吸收和借鉴。但

果真是如此吗？雅各布和马祖卡托2016年在《重新思考资本主义》一书的导言中指出，主流经济学不能解释西方资本主义在最近十年中面临的主要问题——疲软的增长、金融不稳定、下降的投资、金融化、生活水平的停滞、日益上升的不平等和危险的环境风险。……幸运的是，一些伟大经济学家的著作为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基础，这些经济学家是卡尔·波拉尼、约瑟夫·熊彼特和梅纳德·凯恩斯以及最近的演化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就像本书各章所表明的，以这种经济学为基础的分析可以对目前的经济政策进行彻底的批判，并提出强有力的替代性观点。

其次，推动中国经济学的多元化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借鉴“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包括世界所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积极成果，这可以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有益滋养。……我们应该吸收借鉴，但不能把一种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当成‘唯一准则’，不能企图用一种模式来改造整个世界，否则就容易滑入机械论的泥坑。”在我国，目前仍存在着一种企图用“西方经济学”的一种模式彻底改造中国经济学教育的强大力量，在我国高等学校的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教学开设“西方政治经济学”课程将成为抵消这种教条主义的一种力量，从而推动中国经济学的多元化发展。因此，笔者建议对我国高等学校财经类专业西方经济理论的本科课程设置进行改革，将“西方政治经济学”增列为与“西方经济学”具有同等地位的核心课程。

最后，在高等学校财经类专业中开设“西方政治经济学”核心课程可以加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学教育中的地位，为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提供更有借鉴价值的西方经济理论。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西方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许多共

同的基础，但正如老制度主义经济学代表人物霍奇逊指出的，老制度主义经济学虽有其优点，但它并没有马克思那种提供理论体系的能力，学生们可以通过对“西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学习，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解，更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其二，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调节学派和社会积累学派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发展，但这两个学派都是在批判性地吸收“西方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创立的。其三，通过批判性地综合，可以将“西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纳入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之中。最后，由于“西方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研究更多的带有批判的性质，因而对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和规律的研究比“西方经济学”更真实和更客观，这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设具有直接的借鉴价值。

【作者简介】

贾根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